

# 精英文化、日常生活与符号的能力

## ——英国文化主义中文化权力论的嬗变<sup>\*</sup>

杨东篱

**内容提要** 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化权力论是文化研究思潮获得国际影响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很少有研究聚焦于此。与文化领导权不同，英国文化主义中的文化权力论将文化权力视为文化独立、自主介入并影响社会生活的能力。不过，这种文化权力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理论的嬗变，主要体现为研究立场从精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研究内容从宏观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研究方法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在此过程中，英国文化主义对文化权力的理解也完成了转变，即文化权力从精英文化能力，变为日常生活能力乃至符号能力。这一嬗变过程同社会现实的内在关联可以揭示文化研究思潮产生国际影响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文化主义 文化研究 文化权力 历史有机性

文化研究思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蜚声国际学界。人们一般将该思潮的起因归结为英国文化主义，尤其是其中包含的英国文化研究对文化权力的思考。虽然目前不少学者对英国文化主义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文化权力问题，但明确、集

---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葛兰西转向’后的英国文化研究”(15BZW014)、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及其中国启示”(20820IFYT17026)的阶段性成果，亦受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一流学科建设资助。

中地将英国文化主义中的文化权力论当作研究对象的情况却比较鲜见。<sup>①</sup> 本文力图对整个英国文化主义中文化权力论的嬗变以及引发嬗变的现实历史因素做出详细的梳理与阐释, 希望能够更加深刻和准确地解释英国文化主义与“文化研究”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进而揭示该思潮产生世界性影响与陷入当下困境的原因。

不过, 在进入对上述主题的讨论之前, 有必要对英国文化主义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做出澄清。英国文化主义通常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英国文化研究。两者确实关联紧密, 但却有着不小的区别。严格意义上的英国文化研究专指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引领文化研究思潮的伯明翰学派的理念、内容与方法, 而英国文化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则更加宽泛。它能够包含英国文化研究, 却又不限于后者。英国文化主义源自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承认文化区别于实际社会, 并且强调文化是实际社会以外的可行途径”<sup>②</sup>。它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传统, 强调文化独立、自主介入社会生活, 解决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重要价值。十九世纪以来, 马修·阿诺德、T. S. 艾略特、F. R. 利维斯全面继承了文化主义, 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现实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 进而

① 国内外学界都很关注英国文化主义中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政治思想, 对该思想的探讨自然会涉及对文化权力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比如胡疆锋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杨东篱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1年)、徐德林的《重返伯明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和磊的《伯明翰学派: 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位迎苏的《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年)、格莱厄姆·特纳的《英国文化研究: 一个导言》(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的《通俗文化理论导论》(Dominic Strinati,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约翰·斯道雷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1)等专著, 陶东风的《文化研究: 在体制与学科之间游走》(载《当代文坛》2015年第3期)、陆扬的《文化研究的三个范式》(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金惠敏的《一个定义, 一种历史——威廉斯对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的理论贡献》(载《外国文学》2006年第7期)、萧俊明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探源》(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杨东篱的《伯明翰学派与文化民粹主义》(载《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历史、政治与后现代主义: 霍尔与文化研究》(Lawrence Grossberg, “History, 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 Stuart Hall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6 [1986])、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文化研究对阵政治经济学: 有其他人厌倦了这场争论吗?》(Lawrence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 i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1 [1995])等单篇论文。然而, 这些论著并没有将文化权力提取出来作为单独的问题进行明确、集中的探讨, 也没有从文化权力出发来思考文化权力与文化研究以及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关联。目前, 国内仅有几篇论文明确论及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化权力论, 比如陶东风的《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李永新的《“强制阐释”的困局与“本体阐释”的启示——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强制阐释分析》(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国外的相关论著也不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马克·吉布森的《文化与权力: 文化研究史》(Mark Gibson, *Culture and Power: A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和布赖农·伍德的《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与领导权问题》(Brennon Wood, “Stuart Hall’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Hegemony”,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9.9 [1998])等。

②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吴松江、张文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20页。

开启了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伯明翰学派学者的英国文化研究潮流。从阿诺德直到霍尔等都是英国本土学者，他们的研究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一个系列，这一系列可以被统一概括为英国文化主义。

## 一、文化权力与文化领导权辨析

文化权力很容易与文化领导权混淆。两者都是对文化实施社会功能这一现象的概括，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权力指的是文化独立、自主介入，以文化自身逻辑来影响社会现实的能力，而文化领导权指的则是文化借助政治逻辑在社会现实中发挥社会功能的能力。

就文化权力而言，学界对从权力关系角度研究文化一直比较敏感，认为这类研究有政治干扰学术独立性的嫌疑，“人们甚至抵制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理解文化的观点”<sup>①</sup>。然而，这更加证实了“权力”在研究文化问题中的重要性。很多学者之所以抵制文化研究思考权力问题，是因为他们将文化权力理解为文化的政治权力，不希望文化研究成为政治研究的附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文化权力不是文化的政治权力，而是文化自身内持并可以影响外在于文化的其他社会因素的权力。思考文化权力问题不仅不会使文化研究成为政治的附庸，反而更有助于确立文化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文化明确区别于政治、经济等有别于文化的其他社会因素。

在西方学界，最早将“权力”概念明确引入文化理论的是米歇尔·福柯。然而，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思考则源自马克思。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想观念“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sup>②</sup>。为了合理分配、运用多种意识与文化资源，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维系社会结构在意识层面的统一性，社会会自发设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意识。相对于同一社会中的其他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就拥有了权力。在马克思这里，文化权力意味着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统治与调节。同时，这种文化权力体现了文化不以依附姿态，而是独立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很多西方学者都对与文化权力问题有关的文化的社会功能问题进行过思考，比如葛兰西认为文化会通过文化领导权引导社会生活的变革，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

<sup>①</sup> 马克·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王加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525页。

学者认为工业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会借用工业化的文化对民众实施欺骗与控制，萨特、列斐伏尔等认为文化需要通过文化心理来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福柯认为文化需要在文化内部建立各种因素间的联结关系进而发挥社会作用，杰姆逊、鲍德里亚等则认为文化藉由通过符号消费再生产新文化来影响社会生活。这些理论家总体上都在强调文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然而他们却都忽视了文化在产生社会影响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不自觉地将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理解为是文化与政治、经济、心理因素相融合的结果。因此，他们实际论述的并不是文化的权力，而是文化政治、文化心理、文化经济复合体的权力。只有福柯主张从文化内部来考察文化的社会功能，没有涉及这种复合问题，但他也没有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认为，文化是反思性思维发展出来的累积性结构，会被组织进社会生活，从而独立发挥作用“文化领域是一个有着它们自我结构的领域，因此能够制造一种构成社会性肌体单位的持续性诉求。”<sup>①</sup> 它会“以一种感觉式的媒介形态”，用“‘莎士比亚化’的审美机制，以形象化、具体性的形式传达真理性，既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也塑造着人们的审美习性”，“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情感结构”。<sup>②</sup> 可见文化是通过情感结构来影响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在诠释交往行动意义的基础上塑造个体的自我与生活方式，进而生产生活世界的公共性。文化权力因此体现为文化通过对人心理施加影响，使人产生文化认同，进而对人展开思维与行为规训，实现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治理意图。

综合上述对文化权力的理解，可以认为，文化权力就是文化独立、自主介入，以文化自身逻辑来影响社会现实的能力。它是文化的“影响力、规训力与认同力”<sup>③</sup>，是一种微观的、隐性的、知识性的权力。它散布在整体的社会生活中，构成社会团结与结构组织的内在软性力量。文化权力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般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一旦在个人或群体中发挥作用，通常“会比猛烈、直接的暴力元素更易被人从内心接受并付诸实施，而且影响时间往往会较长久”<sup>④</sup>。

文化领导权则是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葛兰西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文化借助政治逻辑在社会现实中发挥功能的能力。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具体解释为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内部宣传符合该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价值体系的能

① Clark Wissler, "The Cultural Area Concept as a Research Lead",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6 (1928), p. 894.

② 详见王杰《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下当代艺术的文化价值》，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70页。

③ 李山《文化权力：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0页。

④ 刘钟华、朝克《权力体系内的文化——文化权力的再认识》，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5期，第181页。

力。该能力会使民众认同这一体系，进而自愿被统治。在文化领导权的建立过程中，能够看到文化借助政治逻辑体现出的强大渗透力量：

葛兰西的“领导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它与“统治”（即国家/公民社会的对立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领导权”有时被用来作为“共同体”或“经济共同体”的对立面，只是为了设置一种历史性的术语。在这一术语当中，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超越了它作为共同体的位置，超越了它经济地位的屏障，渴望达到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领导地位。<sup>①</sup>

文化领导权固然能够帮助文化实现介入社会的目的，但它将文化的社会影响力解释成文化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并没有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不过，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后期确实受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甚至英国文化研究从前期到中后期的核心转向被称为“葛兰西转向”。然而，英国文化研究并没有直接吸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观念，而是通过反思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接合”观念，确立了英国文化研究自身的接合理论，并以此为契机，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具体而言，霍尔参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其对社会生活内部“接合”的强调突破了拉克劳对语言与社会生活“接合”的解释。拉克劳参照葛兰西将“接合”解释为不同社会实践遵循语言逻辑进行的连接，将“接合”解释为语言与社会实践的连接。霍尔则用文化传播的逻辑取代了拉克劳的文化与政治耦合作用的逻辑，同时也在客观上对葛兰西从社会政治生活框架出发理解文化及其功能的做法进行了反拨。此举从传播学的角度更新了文化观念，拓展了研究方法，转移了研究重心，更明确地张扬了民众的文化自主性，创造了新的研究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凸显了英国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发挥社会功能，独立自主地实施文化权力的学术传统。

英国文化主义学术研究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对文化介入社会之功能的强调与阐释。然而，如前所述，从阿诺德直到英国文化研究的英国文化主义都主张文化以独立、自主的整体姿态解决现实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在该前提下，文化权力被理解为文化独立、自主地以整体姿态介入并影响社会现实的能力。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英国文化主义甚至希望用文化来解释现实中的一切政治、经

---

<sup>①</sup> “Preface”, in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xiv.

济、社会活动及现象 “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地审视。”<sup>①</sup>由此，“文化改变了我们以更粗鲁、更简单的方式所理解的权力概念。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政府或军队，它无处不在，从家庭到性别关系到体育和人际关系。我们的身份和主体性都是文化构成的”<sup>②</sup>。英国文化主义对文化权力的这种理解与它对文化的理解有莫大的关系：无论是早期的阿诺德等人，还是后来的威廉斯等人，以及更后来的霍尔等人都倾向于从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理解文化。阿诺德等将文化理解为能实施教育功能的精英文化；威廉斯等将文化理解为能塑造阶级、阶层意识的生活方式；霍尔等将文化理解为能连接经济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这些对文化的理解本身实际已经隐含了对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强调。英国文化主义对文化的这一理解角度与其本土的经验主义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人类学文化功能主义的文化观有关。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权力论虽然会受到不同时期文化观念的影响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它对文化不依附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而独立实施社会功能的强调却始终如一。这或许也是英国文化研究被视为纯正的“文化研究”的根本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化权力论确实是其文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一定意义上认同了马克思的文化权力观，是后者在英国本土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与英国本土之外的相关学者形成了共识。

## 二、大众社会、平民崛起、消费生活与“精英—平民”立场嬗变

如前所述，英国文化主义各个时期的学者主要都从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阐释文化，而他们对文化权力的理解亦有着清晰的演进线索。在这条线索上，英国文化主义理论家们对文化权力的思考有一致又有不同，既相互肯定又彼此争论。这些深入讨论和激烈争辩催生了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内部的重要转变。英国文化主义中文化权力论的嬗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立场从精英主义转向了平民主义；研究内容从宏观文化政治学转向了微观文化政治学；研究方法从单维度转向了多维度。这些嬗变同英国历史背景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第一种嬗变是研究立场从精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英国文化主义前期的学者大部分生活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促使英国从贵族社会走向大众社会，这场革

<sup>①</sup> 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陈永国译，罗钢校，收入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sup>②</sup> Martin Jacques, “Stuart Hall: Cultural Revolutions”, in *Newstatesman*, 126. 12 (1997), p. 25.

命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自主选择。在十八世纪，工业与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再加上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整个欧洲都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然而，各国对各自社会的转型道路的选择却大有差异。法国通过暴力大革命高歌猛进，而英国则基于其一贯的经验主义走上了用工业革命和政治改良代替政治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缓和、持重、平稳的“在这场革命中，最吸引人的是这样的事实，所有必要的变化同时发生并彼此协调得很好。”<sup>①</sup>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英国模式在十九世纪催生出了一个英国式的大众社会。这一大众社会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有着各方面权力相互灵活制衡的政治体制。在工业革命的激发下，英国用1688年的光荣革命完成了从绝对君主专制向多元寡头政治的转化。土地贵族、中等阶级、工资劳动者的权力彼此监督。中等阶级与工资劳动者之间还形成了相互流动的机制“等级社会结构也在向阶级社会结构转变。”<sup>②</sup>二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城市的形成、大众传媒的兴盛和大众阅读的繁荣是市民社会兴起的重要标志。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到1911年，城镇人口达到79%”（详见《光》：220）。英国报刊的数量亦随城市的形成而急剧增加，当时包括《晨报》《共和报》等在内的宣传各阶层观念的报纸有一百多种。同时，阅读开始走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阅读氛围。

各方面权力灵活制约平衡的政治体制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固然带来了历史的进步，但也造成了不少社会弊端，主要体现为由民主机制、财富积累与非精英阶层各方面权利提高所带来的极端功利主义，以及由此生发的个人功利主义、市侩主义、群氓主义等。社会的危机催生了大批试图解决危机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在贵族精英文化教育下成长，因此多站在贵族精英立场，将大众社会危机的产生归罪于工业文明。不过，他们也注意到了社会为大众阅读和获取文化提供的条件。这样，通过自上而下的精英文化教育建立文化权力来纠正各种功利主义带来的弊端，就成了当时知识分子解决社会危机问题的主要途径。阿诺德、艾略特与利维斯就是这批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阿诺德等人明确指出，文化就等同于精英文化，是“对于完美的追求，美与智，或者换句话说，甜美与光明是其性质”<sup>③</sup>。当精英文化通过教育得到大

---

① George Townsend Warner, C. H. K. Marten and D. Erskine Muir, *The New Groundwork of British History*, London and Glasgow: Blackie and Son, Ltd, 1943, p. 740.

② 刘成、胡传胜、陆伟芳、傅新球《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英国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光》”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81.

规模普及时，民众就可以在心理上被美与善的精英文化熏陶和感染，进而自觉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纠正广泛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功利主义、市侩主义、流氓主义等不良倾向。在阿诺德等人看来，这种精英文化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而精英文化教育则表现为通过考察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展开文学教育与文学批评。不过，精英文化教育的直接实施对象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社会中的“少数人”即社会精英。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普通民众，阿诺德等知识分子则以民众教育者导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间接塑造民众的文化心理与行为。艾略特更特别指出，这种塑造的目的不是对人类个体或者一个群体及一个阶层的培养，而是要帮助人类建立一种跨越群体、阶层界限的全社会的共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宏观层面解决文化危机“个体的文化依赖于群体或阶级的文化，而群体或阶级的文化又依附于它们所属的整个社会。”<sup>①</sup>利维斯因此具体阐述了实施精英文化教育的方法。他认为，首先应该将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甄别与筛选出来，“坚持要做重大的甄别区分，认定文学史里的名字远非都真正属于那个意义重大的创造性成就的王国”<sup>②</sup>。利维斯推崇的经典作家包括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查尔斯·狄更斯等。他继而指出，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教授经典文学的英文教育设置为大学人文教学的核心课程<sup>③</sup>，力图借此建构共同文化并培育批判大众社会的精英群体。

可见，阿诺德、艾略特与利维斯都主张通过精英文化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文化权力，帮助民众抵制商品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大众文化对其感官和心灵的腐蚀，建设具有正面精神导向作用的共同文化。文化权力就是精英文化实施教育功能的能力。这构成了英国文化主义第一阶段的文化权力论。不过，阿诺德等学者并未对精英文化教育的实施效果盲目乐观。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进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强大威力及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合理性“我看到文化没有理由不更加堕落。”(Notes: 19)

阿诺德们的预感可以说是准确的。大众文化的威力在二战之后开始爆发并昭示了平民阶层在大众社会形成之后的进一步崛起。这直接导致英国文化主义转入了第二个阶段。英国文化主义第二阶段的文化权力论主要由英国文化研究前期的

---

<sup>①</sup> T. S. Eliot,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48, p. 2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Note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sup>②</sup> 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页。

<sup>③</sup> See Raymond Tallis, “The Eunuch at the Orgy: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F. R. Leavis”, in Raymond Tallis, *Newton's Sleep*,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30.



学者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提出。这些学者主要活跃于二战之后。战争的打击使英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它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色彩而成为一个福利国家；第二，它不再是一个大国而成为一个小国；第三，它丢掉了一个帝国而重新回到欧洲。大战到现在虽说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变化却是深刻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性质。”<sup>①</sup> 随着英国国家性质的变化，英国国民的内在结构也发生了显著改变，精英阶级元气大伤，而平民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大增：首先，大批英国前殖民地在战后纷纷独立，固有的贵族统治受到了极大冲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解体了，民族主义运动在殖民地蓬勃兴起。”（《英》：347）其次，为了战后本土经济的重建，英国从前殖民地招募了大批劳工。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纷纷涌入英国，壮大了平民阶层的规模。再次，英国的平民在战争中为保家卫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在战后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一次 ‘人民的战争’，与历次战争都有所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人民真心实意地支持战争，投入战争，为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英》：335）再再次，战后英国对福利政策的改进增加了平民阶层接受教育的机会，激发了这个阶层争取文化权利的欲望。最后，冷战的政治局势使得英国民众暂时偏离了本土保守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并乐于接受由美国文化工业带来的大众文化，将其视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然而，崛起的平民阶层偏偏遭遇了二战后政府福利政策的失败 “当支付福利制度的资金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时，就会形成一种阻力，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从六十年代起，这个问题逐渐显得突出。”（《英》：340）福利政策的失败使得许多英国的城市平民频频失业、生活困顿，愤怒情绪一触即发。当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如越战、古巴英雄切·格瓦拉被杀、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等成为平民愤怒情绪爆发的导火索，由此在社会生活中催生出了一场影响深广的反文化运动。<sup>②</sup> 反文化运动的主角是一些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将传统视为社会向前发展的阻力，渴望挣脱一切传统的桎梏，其“反文化”的表现形式“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

<sup>①</sup>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357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英》”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sup>②</sup> 详见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69页。

文化‘革命’”<sup>①</sup>。这些年轻人试图用各种反叛活动表达对主流文化与现存制度的不满，对妇女、少数族裔等社会边缘人群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并以这种方式表达平民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确立自我独立身份的强烈诉求。在反文化运动中，精英主义的文学、文化传统遭遇了抵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思与重估。

英国平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崛起以及英国政府针对平民的执政策略的失败，使得阿诺德等学者的精英文化权力论愈显颓势，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到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就是这批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期刊《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 为阵地表达了系统性的思考。然而，威廉斯他们并没有完全摒弃前期的英国文化主义，而是采取了继承式的批判态度。他们也使用利维斯主义的文本细读法，注意考察文学这类精英文化的权力，但他们的研究立场却因现实中平民阶层的崛起和精英阶层的衰落而开始明确转向平民主义。通过反文化运动，威廉斯等学者敏锐地发现，文学在他们所处时代的影响力实际要逊色于通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推崇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偏见。<sup>②</sup> 因此，他们为文学提出了一个剔除了精英主义光环的定义——用写作的语言进行的交流<sup>③</sup>，并将文学与通俗文化视为同一层次的文化。既然文学的精英主义光环已被剔除，那么文化就不应该一直从精英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于是，威廉斯等学者便突破了传统文化的精英主义局限，将民众的情感、意识、价值观一并纳入对文化的理解中，使文化的定义更趋平民化。这样，就诞生了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sup>④</sup>的文化概念。<sup>⑤</sup> 以此为基础，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学者摒弃了阿诺德等学者居高临下的态度，主张知识分子应该直接与民众交流，帮助他们思考，为他们提供建设通俗文化的方法和途径，激发他们建设通俗文化自觉、自主的意识和潜能，进而改造现实的文化生活格局，实现通俗文化的文化权力，以满足平民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确立自我独立身份的诉求。因此，英国文化主义第二阶段的文化权力效应具体而言就是日常生活方式对阶级、阶层意识

① 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第69-70页。

② See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1.

③ See Raymond Williams, *Reading and Criticism*, London: Frederick Muller, 1950, p. 107.

④ Raymond Williams,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13.

⑤ 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也曾将文化解释为“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艾略特认为“生活方式是文化”这一点只有文化精英才能意识到，普通人意识不到。而“整体的生活方式”则意味着非精英的普通民众也会将生活方式视为表达自我情感、意识、价值观的文化，并运用这种文化生产与塑造自己的思维习惯、意图、行为方式以及与自己生活相关的社会机构。这可以维护民众的文化权利，抵制精英文化的压制与大众文化的腐蚀 ( see Notes: 41 )。

的塑造能力。威廉斯曾指出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对各自的“机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意图”的生产与塑造能力就体现了文化的权力<sup>①</sup>；霍加特也说：“在他们[工人]喜好和厌恶的事物上，在‘归属’上，他们是‘工人阶级’。”<sup>②</sup>这种“容易识别的工人阶级生活”<sup>③</sup>对工人意识、习俗的塑造力量就是文化的权力。威廉斯、霍加特无疑都将文化权力看作是日常生活方式对民众意识的塑造能力。对此，汤普森还有着更明确的表述“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sup>④</sup>而民众正是用他们自己的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对传统的精英文化习俗与有等级色彩的法律赋权进行反抗。<sup>⑤</sup>工人阶级的文化权力就在这种“处理”与“反抗”中体现了出来。

就英国文化主义第二阶段的文化权力论而言，当文化权力被理解为日常生活方式对阶级与阶层意识的塑造能力时，文化就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而为全民所共享。这种新的共同文化不仅是反抗精英文化统治的武器，也是抵御文化工业意义上大众文化戕害的利器。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因而不完全迷恋教育对文化介入社会的作用，转而借助公共媒体来实现文化介入。然而，在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那里，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的立场嬗变只是开启却并没有最终完成。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脱胎于早期的英国文化主义，还残留着后者的许多痕迹，主要体现为研究者秉持平民主义但不否认精英文化的价值。尤其是霍加特，他在晚年又重新恢复了早期英国文化主义对引导式教育的重视，只不过没有像后者那样强调教育的精英模式，而是强调教育对普通人独立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由精英转向平民的立场最终由英国文化研究中后期的学者完成。这一历史契机就是1979年的撒切尔新政及其开启的消费时代。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下半叶开始，英国的经济出现了“滞涨”。这一度被认为是“福利政策”的结果。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滞涨”达到了高潮：失业人口大增、罢工不断、经济危机重重。撒切尔上台后，采取了与左派完全对立的政治立

① 详见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405页。

②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 6.

③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 7.

④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杨豫、潘兴明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⑤ See Roy Porter,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Customs in Common by E. P. Thompson", in *The New Republic*, 4 (1992), p. 36.

场，果断抛弃了保守党与工党合作的“共识政治”：“撒切尔上台标志着‘共和政治’的结束。”（《英》：344）然而，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私有化、控制货币、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等（详见《英》：345）却广泛深入地改善了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貌，推动英国迅速进入了消费社会。这甚至导致后来重新上台的工党也倾向于采用具有保守党政治倾向的执政策略。撒切尔的政治立场与其执政的成功严重影响了英国文化研究平民立场的现实合理性，再加上比威廉斯等学者的“文化主义”更适于解释消费社会的结构主义（符号系统理论）的冲击，英国文化研究的立场与观念岌岌可危。

为了拯救危机中的英国文化研究，霍尔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撒切尔的保守党立场，再次坚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平民主义信心；另一方面则借鉴结构主义，将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权力论进行了适应当下社会语境的改造。霍尔对撒切尔的批判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二十世纪左翼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他激烈地批评撒切尔政府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但也并没有否认这类政策在现实社会中的成功，如撒切尔政府的“权威民众主义”<sup>①</sup>对社会民众的强大整合能力。他的批评集中于撒切尔主义造成的消费社会弊端“撒切尔的意识形态提议与经济成就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sup>②</sup>这集中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导引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消费生活。在这种生活里，大部分人沉溺于符号制造的幻觉，丧失了自主创造和消费文化的能力。作为一个非英国本土的移民，霍尔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符号性与幻觉性感同身受，因此，他主张站在真正的民众立场上建设真正的民众文化，反抗后现代主义消费生活的侵蚀，而民众建设民众文化的原料就是消费社会的符号。文化因而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后期阶段被理解为一种符号系统。威廉斯首先提出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符号系统，通过它，一种社会秩序被必然地传播、再生产、体验与探索”<sup>③</sup>；然后霍尔指出“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sup>④</sup>；最后，费斯克将文化解释为是“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sup>⑤</sup>。当文化被这样理解时，文化权力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对文本的解释与再创作问题，可以借用传播学、符号学理论对它进行解释。比如在威廉

① Chris R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 149.

② Chris Rojek, *Stuart Hall*, p. 147.

③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83, p. 13.

④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页。

⑤ 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斯这里，文化权力可以被解释为文化“传播、再生产、体验与探索”<sup>①</sup> 社会秩序的能力。霍尔比威廉斯更关注文化介入社会的现实功能，因此，文化被他视为一种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通过传播意识形态来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使其产生实际效果，而文化权力就是文化“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sup>②</sup> 的能力。费斯克对文化的理解肯定了民众的自主性，但没有过度张扬民众在文化创造、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虽然威廉斯、霍尔、费斯克对文化及文化权力的理解各有侧重，但他们大体上都把文化权力理解为文化符号在联结社会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时建构出来的权力。这就是英国文化主义第三阶段的文化权力论。这一新的文化权力论赋予各类人群以自主生产和传播文化的权利，进一步颠覆了文化只能由专业人士创造和传播的传统观念，从而将普通人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的地位上解放出来。文化权力由此更非精英阶层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积极创造自我意义、快感，对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能力。第三阶段的文化权力论实际比第二阶段更具体，也更鲜明地诠释了平民立场。然而，英国文化主义第三阶段的文化权力论与前两阶段不同，由于过分突出和强调普通人在意义生产与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因此虽然尽量避免，但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

### 三、民族精神、阶级意识、符号抵抗与“宏观—微观”内容嬗变

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发生的第二种嬗变是研究内容从宏观文化政治学转向微观文化政治学。<sup>③</sup> 英国文化研究由于特别强调平民立场对精英立场的突破，因此似乎比早期英国文化主义的学者多了一层文化政治学色彩。实际上，早期英

①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p. 13.

② 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3页。

③ 宏观政治指的是“系统性的、中心性的、一元的、宏观层面的政治。它关注于改变经济和国家的结构，以国家、政党、议会、阶级、民族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与此相应，微观政治则指的是“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发展起来的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强调主体行动的、自主的政治。它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推翻特殊机构中的权力与等级，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详见李素艳《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解构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维度》，载《理论探讨》2009年第4期，第71页）。由此，宏观文化政治学指的就是研究系统性、中心性、一元性与宏观性的文化政治的科学，它关注文化对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影响，以文化与国家、政党、议会、阶级、民族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与此相应的微观文化政治学则指的是研究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发展起来的反体系性、反中心、多元化、强调主体行动、自主的文化政治的科学，它关注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文化革命，对抗特殊机构中的文化权力与等级，实现个人的文化解放。

国文化主义的学者对文化及文化权力的文化政治性质也多有思考，但因为后者属于宏观文化政治学范畴，所以不易让人将他们的思考与他们的文化研究联系起来。

早期英国文化主义的宏观文化政治学依然与十九世纪英国的历史背景关联密切。如前所述，十九世纪的英国在国内受工业革命的推动，建立了权力灵活制衡的政治体制，并逐渐形成了大众社会。然而，当时专注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现代性发展的英国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自己既有的国际影响力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因此，十九世纪的英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其往昔的霸主身份并不相符，甚至显出了衰落的迹象：第一，英国的工业与金融优势在 1815 年之后就不再转化为军事优势了，其军事也同时趋于腐败，而在这之前，英国政府是可以通过武力或用武力威胁来保护本国利益的。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庞杂的殖民统治拖垮了英国工业与金融创造的财力。英国每年要支出 150 万英镑保卫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英国作家吉卜林将这些殖民地称为“白人的负担”（《光》：419），“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沉重的磨盘”（《光》：419）。第二，十九世纪的英国在经济领域也没有发挥霸主作用。英国在 1846 年废除了《谷物法》，在 1849 年废除了《航海条例》。这似乎可以被视为欧洲自由贸易时代的开始。第三，十九世纪的英国无法创造国际共识。一个能够创造国际共识的国家需要协调国内外各个具体阶级的利益，而十九世纪的英国无法做到这一点。

英国在十九世纪世界格局中的尴尬地位使得英国本土的知识分子迅速感到了巩固英国本土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因此，当时的精英文化建设除了担负祛除大众社会弊端的任务，还被阿诺德等知识分子赋予了区分英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从而巩固英国本土民族精神的任务。这两种任务其实都致力于确立英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阿诺德曾主张在大学课堂里用英语文学代替拉丁和希腊经典，使英国大学生成为具有英国民族精神的精英文化传承者，这些精英分子在以精英文化教育民众抵御大众文化侵蚀的同时，也能构建起统一的英国民族文化传统。“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也是所有天才的创造力与文学艺术绽放的时候。”<sup>①</sup> 艾略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英国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构建，但他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如乔治·查普曼、约翰·多恩这样的英国民族作家。他明

<sup>①</sup>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p. 79.

确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来获得建构精英主义共同文化的基础 “在现代欧洲的所有语言中，对于写作诗歌来说，英语被认为是最丰富的。”（Notes: 110）利维斯则是早期英国文化主义者中对本土民族文化建设用力最多之人：他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有机共同体的追念乃至积极写作文学批评、大力推行英语专业学科化的努力都是为了延续和弘扬英国的本土文化资源，恢复民族共同的有机文化，提高民众对大众文化的防范意识。佩里·安德森曾指出，利维斯的措施不仅有助于民众抵御大众文化，更有助于推动英国民族文化与文化研究的形成，因为进行文学批评，发掘和重塑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就代表着一种庇护”。<sup>①</sup>

早期英国文化主义主张通过精英文化的文化权力实现对英国本土民族精神的巩固，进而树立英国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信。这无疑属于一种宏观的文化政治学。然而，二战之后，随着精英贵族阶层的衰落、福利政策的失败与平民阶层的崛起，英国文化主义对文化政治的关注开始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不过，英国文化主义转入微观文化政治的直接契机却是新旧左派的历史更替。在二战后的国内政治风云变幻之时，英国左派思想家在政治上也出现了两难的困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左派因为国际意识形态两大阵营的“冷战”，既无法认同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也无法认同斯大林专政下的苏联社会主义，由此产生了内部分化，其结果是老左派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新左派出场来解决左派在政治立场上的两难问题，他们的策略就是把注意力从国际政治转向国内政治。英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当时正在通过国内风起云涌、波及甚广的反文化运动集中体现出来，新左派于是响应了反文化运动，将对各国意识形态冲突的关注转向了对英国社会生活中“少数人”的精英文化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形成的政治性对立的研究，比如通过对摇滚乐、嬉皮士文化等流行文化形式的分析去思考 and 论述女性解放、黑人民权、工人权益、反战和平等政治问题。这种做法被看作是“在斯大林主义与社会民主之间占领一个第三空间并抵制两者在道德与政治上破产的一种尝试”<sup>②</sup>。新左派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将左派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从宏观政治转向了微观政治，以此来解决老左派关于宏观政治的立场困境。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几乎都是新左派的成员。然而，也应该注意到，他们走向文化微观政治学研究也与他们自身的平民出身以及

<sup>①</sup> See Andrew Milner,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London: UCL Press, 1994, pp. 32 – 33.

<sup>②</sup> Madeleine Davis,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New Left”, in Martin Klimke and Joachim Scharlot, eds., *1968 i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45.

他们年轻时的成人教育教师经历有关。

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从反文化运动中发现了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塑造民众阶级与阶层意识的力量，这就是民众文化的文化权力。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文化必然进入社会生产、交流的制度结构，成为塑造一个阶级自觉意识的土壤与根基。汤普森指出，阶级并不是因经济地位自然而然形成的。阶级形成于经济，也形成于文化。<sup>①</sup> 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的“有机”生活的各个侧面如“工人俱乐部、唱歌的方式、铜管乐队、过期的杂志、封闭的集体游戏”等进行了民族志的调研和描述<sup>②</sup>，特别提出正是这些密切关联的有机生活经验培育了工人的自觉阶级意识。威廉斯也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文化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不是会场，也不是语言的某种特殊用法，而是基本的集体观念，以及从集体观念而来的机构、习俗、思想习惯和意图。”<sup>③</sup> 而工人阶级的集体观念以及由观念而来的机构、习俗、思想习惯和意图就培养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无论是威廉斯、霍加特还是汤普森，都从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入手探讨其对民众阶级意识的塑造，这就将文化政治从关注稳固民族精神的宏观层面转移到了关注以日常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的关联为核心的微观层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学者将文化理解为日常生活方式，又将文化权力解释成是日常生活方式的政治功能，但他们的文化权力论很显然是以文化与阶级以及与此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权利等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的还是文化对国家组织结构的影响。他们研究的总体思路并没有完全摆脱宏观文化政治学的框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微观文化政治学。就此而言，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的内容嬗变在英国文化研究早期尚未完成。

文化与阶级形成之间的关系这类宏观问题到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中后期开始渐渐被淡化，这时文化权力研究中的宏观文化政治学才真正让位于微观文化政治学。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撒切尔新政的成功引领整个英国进入了消费社会，后者体现为统治阶级通过消费来组织和控制社会。消费的商品因此普遍被附加了意识形态的意义，从而使消费品在使用价值之外又具有了符号价值，构成为符号。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制因此可以通过对消费符号的组织与编码为社会人群划分阶层和等级，进而完成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

① 详见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 6 页。

② See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 251.

③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 405 页。



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sup>①</sup>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为代表的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关注文化作为日常生活方式对阶级意识的塑造，而消费社会则将日常生活方式符号化了。这使得消费社会的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文化创造主动权，也拥有了通过主动创造文化来反抗主流文化的现实可能性，而这之前民众只能被动地使自己的生活方式被承认为是民众的文化。如此而言，在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中后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社会现实的变化为微观政治学的展开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这也倒逼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化权力论在威廉斯等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突破。

当时传入英国并有助于解决英国消费社会问题的结构主义对这种突破起到了推动作用。结构主义主张文化的政治性与表征性，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和个人在无意识层面的影响，“在我们内心中刻下烙印，把我们卷进这一无形的、没有穷尽的话语流，同时把我们塑造成型”<sup>②</sup>。这揭示出了比日常生活方式更深层的微观文化政治。此外，福柯对微观权力的解释、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也为该微观文化政治学的转型推波助澜。英国文化研究对微观文化政治学的诠释集中体现在霍尔、费斯克等人的文化权力研究中。这些学者不再从文化与阶级关系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各阶层日常文化传播行为的角度去解释文化权力问题。他们以不同方式诠释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传媒针对主流文化进行文化抵抗的途径。比如霍尔认为“媒介信息根植于在现实的日常感知的信念与实践形成的预设”<sup>③</sup>，受众因此不会成为媒介文本制作者的标准的、理想的受众，他会在自身种族、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对媒介文本进行多义解读，反抗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规训意图。费斯克则比霍尔更进一步突出了民众抵抗的自主意识。他解释说，民众会识别那些“由社会范畴所强加的行为限制与身份认同的约束”<sup>④</sup>以及种种摆脱主导文化生产者控制的“潜在意义”<sup>⑤</sup>，进而在主流文化与自己日常生活之间建立积极的意义联系，实现对主流文化的抵抗。这种抵抗基本通过传媒来进行，它或是借助组合、拼贴主流文化以表达自己的文化意识，或是完全重新解释主流文化，发起“符号游击战”。

---

①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② 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Routledge, 1978, p. 62.

③ Chris Rojek, *Stuart Hall*, p. 93.

④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⑤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10页。

#### 四、普及教育、日常经验、混杂生存与“单维—多维”方法嬗变

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的第三种嬗变是其研究方法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这种嬗变依然跟英国的历史变迁血肉相连。早期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化权力研究注重使用审美的文学批评方法。这当然与阿诺德等学者对文化精英主义的理解有关，但也与十九世纪英国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认同有关。如前所述，工业革命的效果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初步体现了出来，灵活的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市民社会也随之兴起。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争取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民众的文化权利要求集中体现为要求受教育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大力争取普选权并参与了国家管理的宪章运动，这促使英国政府开始重视平民子弟接受教育的权利。1851年，宪章运动代表大会通过了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决议，并成立了国家管理各级教育的领导机构。普及教育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大学高等教育也开始走向普及：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伦敦大学的成立为标志，扩大高等教育对象、为民众服务的“非宗教[的]，讲求实用”（《光》：297）的新大学运动蓬勃展开。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所有的传统大学都进行了改革，实施了大学推广运动。与此同时，在社会转型中丧失了政治优越感的贵族精英也希望通过教育来保持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权力。民众的普及教育因此成为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重视教育普及的社会背景为阿诺德等早期英国文化主义学者提供了通过教育来纠正大众社会弊端的条件。同时，在精英文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早期英国文化主义学者还站在贵族精英立场上坚守精英文化的文化权力，因此，他们自然在研究方面强调使用审美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教育为民众服务的时代潮流又使得他们的文学批评法与传统的文学批评法判然有别，后者强调通过对文学文本自身的细读和批评来分析文本的内容意义与审美价值，而早期英国文化主义的学者则希望通过文学文本本身的细读和批评培养教育大众，进而实现精英文化的文化权力。在他们这里，“文学批评虽然首先是一种学术话语，但它的本质却是由它与学术圈外的世界所缔结的强力而直接的关联所定义”<sup>①</sup>。不过，早期的英国文化主义者对如何细读和批评文学文本却有着不同意见。阿诺德认为，不需要对文学

<sup>①</sup> 约瑟夫·诺思《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页。译文有所改动。

文本进行人为的细读与批评，文学文本本身就可以产生文学批评的效果，将人们从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诗的主导观念就是人性各方面尽善与完美，这是一种真实与无价的观念，虽然它还不能成功地克服我们身上明显的动物性弊端，将人性引向道德（这是宗教的主导观念），但它已经拥有这种能力。若佐以宗教观念虔诚的能力，它注定会传递与主导其他事物。”<sup>①</sup>艾略特则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必须同时放在文学审美、社会历史、宗教伦理的多重维度里进行综合评判。在这些维度里，宗教的评判标准尤其重要，因为“文化是与宗教相伴出现和发展起来的”（Notes: 15）。他甚至希望通过宗教批评来完善文学批评，然后在此基础上建设拯救文化危机的共同文化。而利维斯则明确主张对文学文本进行同传统文学研究一样纯粹审美的细读批评，因为传承“伟大的文学传统”的经典文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义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sup>②</sup>。经典文本因而可以激发人性的活力，抵制工业文明带来的思维僵化和机械化，重构有机文化社会，拯救现实的文化危机。虽然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对如何细读和批评文学文本的理解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力图通过建立与审美密切相关的文学细读与批评模式来解决现实的文化危机问题。

英国文化研究早期的学者威廉斯、霍加特一开始延续了阿诺德等学者的与审美密切相关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汤普森却对这种方法颇有微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像威廉斯一样]抛弃了斗争、权利、意识形态和唯物主义等重要观念”<sup>③</sup>。这一批评虽然不能说绝对正确，但对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偏离现实的倾向却切中肯綮。这也似乎成了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多维研究方法的契机。威廉斯、霍加特虽然没有对汤普森这一观点做太多回应，但此后的确不再那么执着于文学的文本审美批评，而直接身体力行地介入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发展出了更多新的研究方法。威廉斯等学者对新研究方法的拓展当然并不仅仅缘于汤普森的批评，他们也响应了反文化运动，致力于发掘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对民众阶级意识的塑造能力。当时民众日常生活经验的主要来源当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方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的政治局势使得英国民众暂时偏离了本土保守的思想和文化传统，而对由美国文化工业带来的大众文化情

①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p. 67.

② 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第4页。

③ 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李永新、陈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有独钟。这些大众文化在当时的英国“被转用来表达不妥协的、年轻的、城市工人阶级的自我”<sup>①</sup>，在客观上逐渐演变成为承载平民阶层日常生活情感、意识、价值观的文化形态。这构成了他们有别于传统贵族、精英文化，甚至有别于传统平民阶层的“自己的”文化。这样一来，大众文化媒介亦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经验新的重要来源。威廉斯等学者要突破阿诺德等学者的精英文化权力观，就需要找到有别于文学批评的新方法，于是，与强调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以及强调日常生活经验对民众阶级意识塑造能力的文化权力观相适应，威廉斯等学者就将新方法锁定为媒介批评法、民族志研究法以及历史、政治批评法等。

威廉斯使用媒介批评法，在对报纸、电视节目、娱乐广告等媒介产品的分析中思考和界定文化、理解大众、评价民众在文化生产中的地位、解释通俗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霍加特虽也使用过媒介批评法，但他更具特色的创造却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民族志研究。通过民族志的方法，霍加特对年少时代的工人阶级生活经验做出了回忆和梳理，思考了如何界定文化、如何生产与创造通俗文化、如何站在通俗文化角度批判商业文化等问题。格罗斯伯格就此评价说“这种知识不会通过其他途径而获得。它是一种霍加特多次描述过的诗意的、富有隐喻色彩的、本能的和主观的知识。”<sup>②</sup> 汤普森则偏爱历史评论和政治批评法。他梳理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通过分析史料总结工人文化中蕴含的阶级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民众自主创造文化的动机与效果。同时，他不仅关注历史中的阶级政治，也关注现实中的阶级政治。而通过政治批评的方法，汤普森对当时英国社会中工人与政府的关系发表了大量评论，这些评论与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理解遥相呼应。可以说“汤普森将历史学家作为终身事业，也曾是一个呼吁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视野带进了学术与文化主流关注的中心”<sup>③</sup>。

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中后期，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符号逻辑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流行。符号逻辑的流行固然是消费社会独特管理和组织方式的结果，但也在客观上适应了消费社会中人们的多结构、多文化的混杂生存状态。甚至这种混杂式生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导致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后期更新研究方法的更重要的原因。按照 J. 彼得斯 (J. Pieterse) 的划分，消费社会的混杂存在状态可被分为

① 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46-147页。

② Lawrence Grossberg, "Richard Hoggart,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Demands of the Present", in S. Owen, ed., *Richard Hoggart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08, p. 58.

③ Dorothy Thompson, "The Essential E. P. Thompson", in *Publishers Weekly*, 26 (2001), p. 75.

结构混杂与文化混杂两种类型。<sup>①</sup> 结构混杂指的是各种社会与机构的混杂场所，比如某些边境地区，它增加了人们在开放组织中的选择范围。文化混杂则呈现为因不同种族或不同阶层在同一地区的混居、通婚而形成的混杂性文化，或是因不同传播媒介或不同艺术形式于同一时空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混杂性文化。混杂性文化很难用传统的文化标准去衡量，也很难用传统的文化类型去框定。无论是结构混杂还是文化混杂，都导致了社会个体身份定位的多重性与模糊性。民众的文化参与一直是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民众个体身份定位的多重与模糊就导致针对民众文化参与问题的研究方法更趋混杂与多元化。这样，随着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中后期学者对文化是“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的理解，英国文化研究就在原有方法之外又创造了符号分析、个案分析、数理分类统计、调研访谈、心理分析等更多类型的研究方法。霍尔、威利斯（Paul Willis）、吉尔罗伊（Paul Gilroy）、费斯克、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莫利（David Morley）、赫伯狄格（Dick Hebdige）等人都是英国文化研究中后期新方法的积极实践者。与早期英国文化主义推崇的以单一文学批评介入社会现实解决所有文化问题的单维度方法相比，英国文化研究从早期的文本分析、传媒批评、民族志方法、历史评论、政治批评到中后期的符号分析、个案分析、数理分类统计、调研访谈、心理分析等林林总总的文化研究法，无疑可被概括为是一种多维度的研究法。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文化主义中文化权力论的三种主要嬗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这三种嬗变彼此之间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密切关联：伴随其研究立场从精英主义转向平民主义，其研究内容也开始从宏观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这一研究内容的转向又引发了研究方法从单维向多维的发展。除此之外，三种主要嬗变还连带产生了其他的相关嬗变，比如研究内容的转向导致研究的关注点从宏观政治转向了微观的日常生活；研究立场的转向导致研究的价值取向从现代主义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的转向导致研究对象从细分转向了泛化等等。

### 结语：英国文化主义中文化权力论的历史有机性

如前所述，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的历次嬗变都以现实历史事件的发生、现实历史语境的变迁为契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历史现实问题在英国文化

---

<sup>①</sup> 参见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主义发展中的学理反应。这构成了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的历史有机性，也是该理论的主要特色。

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与英国人类学的文化功能主义一样，其历史有机性实际根源于英国本土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经验主义强调知识的感受经验性、研究对象的具体特殊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实证性。“在几乎任何一个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世界获得认知的作者那里都可以找到模糊的经验主义。”<sup>①</sup>英国文化主义学者们秉承了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传统，对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现实问题高度敏感，并特别青睐通过实证的方法使问题在现实中获得实际的解决。这就促使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逐渐成长为深植于本土现实土壤的有机研究。“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与理论成就的人工制品，也根植于社会实践与人类的内心（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sup>②</sup>

正是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的历史有机性，而不是学界一般认为的这一理论本身的学理内涵，才是文化研究思潮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根本原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逐渐从二战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获得了新生。在这些国家里，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基本完成，成熟的民主制度普遍建立，相关的社会机制获得完善，本国民众各方面的权利也得到了有效维护。民众的社会权利意识因而开始增强，政治与生活的关联也逐渐加深，对政治的关注焦点开始从悬置于生活之上的宏观层面走向了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微观层面，即象征政治、符号政治层面。历史现实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在一定程度上从实践的聚合向符号的联结发生转化。对历史现实的反思与对人文学理问题的探索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时代开始逐渐排斥悬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粹”人文研究，而呼唤一种能够与历史现实相融的有“温度”的人文研究。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化权力论在学理与现实的直接互动中生长，聚焦文化介入现实的途径与效果，迎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一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国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显学。

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的历史有机性无疑为这一理论带来了创新与发展的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陷。英国文化主义的学者会直接将文化权力论应用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努力促成其设想在现实层面的实现。他们自然十分自信于文化影响社会现实的能力，但这也容易导致某种“文化至上”的观念。这

---

<sup>①</sup> Marco Sgarbi,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and the Rise of British Empiricism: Logic and Epistemology in the British Isles (1570 - 1689)*,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Dordrecht, 2013, p. 8.

<sup>②</sup> Martin Middeke, Timo Müller, Christina Wald and Hubert Zap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tuttgart • 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2012, p. 271.

一观念并非认真考察现实中文化传播效果的结果，而只是对文化能力的理论预设，它会导致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在一定程度上疏离现实，丧失批判精神，弱化介入能力，忽视受众心理，进而不自觉地陷入研究的困境。英国文化主义后期的文化民粹主义困境<sup>①</sup>就是其文化权力论之历史有机性带来的负面后果。

要突破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的历史有机性造成的困境就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权力的种种局限以及文化传播的真实现实进程，并在此前提下重视能够在现实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且介入能力强大的教育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现实为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化权力论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数字技术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当代文化的生产、创造与消费当中，导致当代文化生产和消费语境发生了本质上的新变化；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霸权有了衰落的迹象，对以安全性为主的全球性政治、文化的呼吁和诉求愈来愈强烈；支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美国实现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无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都遭遇到了强大的思想对手：在第三世界国家是民族主义，在发达国家则是平民主义。在这些新历史语境中，以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文化权力与以往相比无疑具有更大的挑战性。结合当代新历史语境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对其涉及的各种具体关系进行重新评估或许才是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突破现有困境的锁钥，也才是英国文化主义文化权力论体现当代价值、产生当代意义、持续葆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 杨东篱，女，1977年生，山东大学文艺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史、文化产业管理。近期发表的论文有《接合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演进》（载《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智取威虎山”IP：文化经济语境下的表征转换、政治祛魅与民族信仰的重建》（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21年第2期）、“Body Symbol and Popular Conceptual Identification for Star Brands”（in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11.11 [2021]）等。

责任编辑：张 锦

<sup>①</sup> 伯明翰学派中后期的文化权力论因过度推崇民众的文化权力，将仪式化的符号抵抗等同于真正的政治抵抗，而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于真实的现实，导致该学派丧失了批判精神与介入能力，并忽视了心理分析与社会伦理分析，最终在学派内部产生了文化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是吉姆·麦克盖根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详见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民粹主义被许多学者看成是该学派在二十一世纪走向衰落的学理原因。